

墨西哥独立媒体研究

刘国发

(武汉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2)

摘要:墨西哥独立媒体包括公民社会模式媒体和市场驱动模式媒体,它们是新兴的媒体或者传统媒体转型的产物。与墨西哥传统的威权模式媒体不同,独立媒体在新闻报道中拥有更多的自主性、多样性和主动性。政治自由化并不是墨西哥独立媒体产生的主要因素,独立媒体也不是政治转型的产物,20世纪80~90年代,在变革推动者、危机事件和私有化改革等多因素作用下,墨西哥威权政府的庇护主义媒体控制制度逐渐瓦解,独立媒体开始出现并发展壮大。

关键词:独立媒体;墨西哥政治;自主性;主动性;多样性

中图分类号:G21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3699(2014)01-0071-05

独立媒体被视为现代民主制度的组成部分,但独立媒体的含义是什么,在墨西哥独立媒体形成前传统媒体与威权政府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独立媒体是如何产生的,萨莉·休斯(Sallie Hughes)和查培尔·劳森(Chappell Lawson)对此进行了开创性研究。

一、独立媒体的界定

依据新闻媒体在新闻报道中是否坚持自主性(autonomy)、报道对象是否具有多样性(diversity)以及在信息集中是否拥有主动性(assertiveness),休斯将墨西哥媒体划分为三类:公民社会模式媒体(civic model)、威权模式媒体(authoritarian model)和市场驱动模式媒体(market-driven model)^[1]。其中威权模式媒体的主要特征是,在新闻报道中缺乏自主性,只表达支持现政府立场的观点,报道对象主要是执政党及政府,反对党和边缘群体很少受到关注,新闻来源主要靠被动接受来自政府的新闻发布和公告。与之相反的是公民社会模式媒体,它的产生能够创造一个充满活力的公共空间,最终带来具有参与意识的公民社会和具有责任意识政府。要做到这一点,公民社会模式媒体必须在新闻报道中拥有自主性,向民众传达多样性的观点,主动地去收集新闻信息。市场驱动模式媒体更多地将新闻报道当作有利可图的生意,它独立于政府却不独立于市场,当观众和广告商需要时,它会提供多样性的政

治信息,在新闻收集过程中表现出主动性。但是出于同样的理由,它们也会对特定的政治力量进行偏袒性的报道,只要这样做符合其集团的利益。

威权模式媒体和公民社会模式媒体、市场驱动模式媒体之间存在明显的区别,前者属于传统媒体,后两者则是新兴媒体或者传统媒体转型的产物。在与政府的关系上,后两种媒体可以归为一类,虽然它们进行新闻报道的初衷不同——一个是为了完成自己在公民社会中的角色,另一个则是为了追求商业利益——但是它们都摆脱了威权政府传统的媒体控制制度,在新闻报道中拥有自主性、多样性和主动性,休斯认为这两类媒体也可以被称为“独立的”(independent)媒体^{[1]6}。

二、庇护主义下墨西哥威权政府的媒体控制机制及其效果

墨西哥的媒体大都掌握在私人手中,主要媒体由一些显要的家族或实力雄厚的财团控制,政府没有试图通过对其国有化而加以控制。政府很少对媒体的报道内容进行审查,媒体具有相当程度的意识形态多样性,左翼立场和右翼立场的报纸可以共存,甚至还会出现一些内容比较偏激的新闻报道。墨西哥也很少出现针对媒体的大规模暴力事件,政府不需要通过暴力威胁来驯服媒体。没有上述媒体控制手段的使用,并不意味着墨西哥政府放弃了对媒体的控制,相反,威权政府对媒体的控制相当严格,媒体也基本上都在其划定的

收稿日期:2013-10-15

作者简介:刘国发(1987-),男,山东菏泽人,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生,主要从事比较政治学研究。

界限内进行新闻报道。墨西哥政府发展出了一套相当精巧而且昂贵的媒体控制机制,在这种控制机制下,媒体自觉充当政府的宣传工具,自愿维护执政的革命制度党一党独大的政治体制。

(一) 庇护主义媒体控制制度的由来

丹尼尔·韩林(Daniel Hallin)等认为在威权体制下,墨西哥传统媒体制度呈现出五个特征:报纸发行量很小、拥护性的新闻报道传统、私有媒体的工具化、公共广播及其监管的政治化、新闻工作的有限自主性^[2]。他们认为,墨西哥传统媒体制度的上述特征应当放在墨西哥庇护主义(clientelism)政治发展模式中去分析,庇护主义这一概念可以有效地分析威权体制下革命制度党政府的媒体控制制度。庇护主义的出现主要基于现代性(modernity):现代性造成传统等级社会结构的崩溃,使个体处于孤立的社会环境中,单个个体无法通过市场、代表性政治机构或普遍的法律制度接近政治和经济中心,加上“社会资本”的缺失,在这种社会环境下,庇护主义成为社会行动者接近政治和经济中心的替代性机制^[2]。在革命制度党统治时期,由于政府是政治资源和经济资源的主要占有者,加上长期实行进口替代工业化政策,以及私有资本的先天不足,使革命制度党成为典型的庇护主义政治机构,而总统则是墨西哥最大的庇护主。作为媒体所有者,信息是他们手上最有价值的私人资源,也是他们同政府进行利益交换的凭借,他们必须通过拥护性新闻报道向政府表示忠诚,才能换来政府的恩惠,维护本集团的利益^[3]。

(二) 墨西哥威权政府的媒体控制机制

在庇护主义媒体控制制度下,选择性奖励是墨西哥政府控制媒体的主要方式。选择性奖励内容范围非常广泛,包括营业执照的颁发、政府广告的投放、政府津贴的发放,还包括各种隐性的财政补贴和免税政策^{[4]123-136}。不同的奖励适用于不同类型的媒体,但是奖励的依据只有一个,那就是发给那些听话的媒体。在慷慨的奖励机制下,媒体所有者获得了丰厚的商业利润,媒体雇佣的编辑、记者也都能过上体面的生活,这个在政府呵护下成长起来的群体,自然愿意去维护这个体制的存在。正如一位墨西哥编辑所说的:“我相信墨西哥的绝大多数媒体从业者都想维持目前这种状态,对于媒体所有者及绝大多数编辑而言,只要支持政府就可以创造相当可观的收入,并且能保证自己过上舒适的生活,同时在社会上也属于精英阶层,何乐而不为呢?”^{[5]28}

针对性惩罚是墨西哥政府控制媒体的补充手段。政府会让那些听话的媒体从业者过上体面的生活,也会让那些越过政府划定界限的人日子不好过,政府的惩罚只针对那些不听话的个体,而不会扩展到媒体行业的其他部分。政府可以针对某个媒体撤销广告,对其进行商业抵制;可以催缴其拖欠的税款或贷款;也可以将其列入黑名单,在发布一些重大新闻消息时禁止其记者参加;还可以将不听话的编辑或记者清除出媒体行业,对一些持敌对立场的编辑或记者,甚至会将其暗杀^{[4]136-144}。面对随时可能到来的政府惩罚,媒体从业者在新闻报道中常常进行自我审查、自我设限,对一些政府不希望出现的新闻有意地回避和过滤。

(三) 墨西哥威权政府媒体控制机制的效果

总体来看,墨西哥威权政府的媒体控制机制是十分有效的。传统媒体主要通过以下三种方式维护墨西哥威权体制:保证政府对公共议程的有效控制,对一些有损政府合法性的新闻主题保持沉默,在选举期间对执政党进行偏袒性报道^{[5]48-58}。

虽然墨西哥的媒体并没有成为政府的宣传工具,但是在威权体制下,传统媒体总是倾向于报道政府优先考虑的事情。报纸的头版总是关于政府领导人政策主张的报道,新闻主播逐字逐句地宣读政府新闻发布会公布的信息,即使像肥皂剧一类的非政治性电视节目,也常常表现出对政府政策的拥护——比如计划生育、妇女教育问题等。有损政府形象的新闻很少在媒体上出现,比如有关政府经济政策不当、政府腐败、毒品交易、选举舞弊、反对党抗议和政治迫害的事件,总会被媒体刻意忽略或弱化处理。墨西哥媒体在选举中会大张旗鼓地偏袒执政党。以1994年总统选举为例,执政的革命制度党及其总统候选人获得了将近50%的电视报道、89%的政党广告和66%的新闻图片宣传^{[5]52}。这还是关于选举的媒体报道有所改进以后的情况,至于之前的1988年总统选举,或者更早以前的选举,媒体报道偏袒革命制度党的情况更加严重。另外,媒体在对不同政党进行报道时措辞和语气也有很大的不同,革命制度党的候选人总是被热情地报道,语气里充满了尊敬,而反对党的候选人则总是被讽刺和挖苦。

三、墨西哥独立媒体产生因素分析

关于独立媒体产生的原因,有一种常识性解释是,20世纪末墨西哥逐渐开放的政治环境是独

立媒体产生的必要条件,也就是说,墨西哥的独立媒体是政治转型的伴生物。劳森认为,政治自由化并不是独立媒体产生的动力,甚至不是主要原因^{[5]3-4}。虽然这个时期墨西哥的政治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政府控制媒体的机制和手段没有发生太多变化,更没有进行促进独立媒体发展的政治改革,墨西哥独立媒体产生另有原因。

(一)媒体所有者观念转变与独立媒体的出现

媒体所有者关于媒体在社会中角色观念的转变和他们朝独立媒体方向的努力,是独立媒体出现的原动力^{[1]33-44}。在庇护主义媒体控制制度下,维护这一体制从而获取经济利益才是媒体所有者的理性选择,选择脱离这一利益联盟明显是一种经济上非理性、政治上有风险的行为,做出这种选择的媒体所有者只能是出于对一种更优先级别的事项的追求,并愿意为此承担风险。墨西哥媒体中最先表现出独立倾向的是印刷媒体,其中走在前面的是两家历史悠久的报纸——《至上报》(*Excelsior*)和《北方报》(*El Norte*),这两家报纸的共性在于,它们都是由具有相似观念和视野的团队创立的,这些团队的核心成员对媒体在社会中的角色持相似的看法。

《至上报》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由具有新闻专业主义精神的胡里奥·斯科尔(Julio Scherer)担任主编,在他的主导下,《至上报》变得越来越具有独立性,越来越敢于超出革命制度党政府为新闻报道设置的界限揭露墨西哥威权体制中不太光鲜的一面。它让民众发现墨西哥还存在着另一个贫穷落后的世界,在它的报道中经常出现无地的农民、失业的工人以及无依无靠者,它还向民众展示了这个国家一直都存在着的冲突和斗争^{[5]66-67}。这些新闻题材很少出现在以前的媒体报道上,《至上报》的新闻报道极大地改变了墨西哥报纸的报道尺度。

另外一家表现出独立倾向的报纸是《北方报》。该报创办于20世纪30年代,1971年由24岁的亚历杭德罗·朱昂科(Alejandro Junco de Vega)继承,他是家族中第一个拥有新闻专业系统训练的媒体人,一经接管《北方报》,他便着手进行专业化改造^{[1]114}。1972~1978年,《北方报》招聘了大批的大学毕业生,替换掉原有的老雇员,这些新人都统一进行了专业的新闻规范培训,他们的薪资和晋升也根据新的原则和标准执行。记者不再从广告中提取佣金,不得轻信官方的任何消息来源,也不允许从政府那里接受津贴,雇员一旦被发现接受了政府贿赂便会遭到解雇。报社给记

者的工资高于同行业从业者很多,还会为那些随政府出访的记者报销食宿,而不是依赖政府。最终,这种专业的新闻规范成为了《北方报》的企业文化,记者对来自政府的物质诱惑产生了本能的抗拒。

可以说,墨西哥独立媒体的产生依赖于一群具有新闻专业主义精神的变革推动者(change agents)。他们对专业的新闻规范持有坚定的信念,对媒体在社会中的角色有新的认识,对政府控制媒体持反对态度。最重要的是,他们控制了媒体的组织资源,有能力塑造自己所在媒体的价值倾向、行为规范和世界观^{[1]38}。

(二)选择性扩散及独立媒体的增加

在政府的主导下,1976年斯科尔和他的核心团队被从《至上报》清除出去,政府用一支更听话、更亲政府的团队替代了斯科尔的团队。但是这场清洗最终证明间接地促进了独立媒体的成长,成为独立媒体发展的分水岭。这些被清除出去的编辑和记者随后创立了一系列的出版物,这些出版物随后成为墨西哥独立媒体中的核心力量^{[4]150}。政府对《至上报》的重组非但没有消除墨西哥新出现的媒体独立倾向,反而将这种独立倾向和专业新闻规范扩散到整个印刷媒体行业。

在斯科尔团队被清除出《至上报》之后,他们没有选择逃避,而是创办了一份更为独立的新闻杂志——《前进》(*Proceso*)。第二年他们接着创办了《一加一报》(*Unomásuno*),后来又创办了《工作日报》(*La Jornada*),这些报纸和杂志所取得的成就远远超过了《至上报》^[6]。这种选择性扩散(selective diffusion)不仅表现在新媒体的创办上,还表现在独立媒体之间的人员流动上,比如《金融家日报》(*El Financiero*)在成立之初便聘请了许多《至上报》的编辑和记者,后来《世界报》(*El Universal*)的转型以及1993年《改革报》(*Reforma*)的创立同样采取了相似的方式。

(三)财务自主与独立媒体独立性的增强

1982年,波蒂略(López Portillo)总统宣布政府将不再在那些对政府有敌意的媒体上投放广告,而其针对的主要对象是《前进》杂志。政府的这项抵制措施几乎将该出版物逼至破产,使它不得通过裁员来维持生存。出乎波蒂略总统意料的是,通过增加销量和预订,《前进》杂志最后成功地弥补了因政府撤销广告带来的损失,在财务上反而更加自主了。到了20世纪90年代,该报80%的收入来自报纸销售,《前进》杂志的主编们从中总结出来的教训是:即使离开政府的资助,独

立媒体也可以生存,财务上的自主可以增加自身的独立性^{[5]69}。

图1展示了墨西哥13家报纸的财务自主性与独立性之间的关系,除了一个显著的例外《工作日报》以外,其余报纸“来自政府广告收入比例”与“媒体独立程度”之间的线性关系表明,财务状况自主性越强的报纸,其独立性就越强,反之则越弱。独立媒体在财务上拥有自主性,是其在新闻报道中展示独立性的重要基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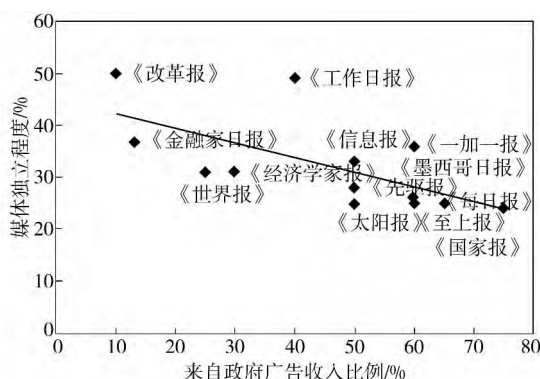


图1 墨西哥主要报纸的财务自主性与独立性^{[5]90}

(四) 危机事件是独立媒体产生的催化剂

在墨西哥独立媒体产生过程中,危机事件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当媒体转型处于一种过渡状态时,一些独立媒体已经出现,专业的新闻报道模式也已经存在,另一些媒体刚刚启动转型,但是仍有一些媒体依然维持着原有的运作方式,此时一些危机事件的出现,往往会影响媒体所有者的选择,成为这些媒体走向独立的契机。与新闻专业主义相比,这些媒体所有者更需要的是“运气”和“时机”^[7]。

与其他传统媒体相比,墨西哥的广播媒体很少提供政治信息,除了一些谈话类节目以外,大部分广播电台只提供娱乐、体育等节目。1985年墨西哥发生的大地震,对广播媒体的转型产生了重要影响。民众在地震中的反应使广播媒体所有者意识到,墨西哥民众不再是政治上愚昧的群体,他们渴望获得真实、准确的信息,这是一个巨大的等待开发的听众市场,只要他们愿意尝试新的广播方式。广播媒体所有者发现新闻广播具有巨大的商业价值,便积极对原有的新闻报道方式进行改革,吸收印刷媒体中出现的专业新闻规范的做法,努力开发这一市场^{[5]99-103}。民众对这种改变产生了强烈的反应,那些率先做出转变的广播电台迅速占领了墨西哥的广播市场,收听率以及随之而来的广告收入也开始大幅攀升。地震后民众对广播媒体关于这次灾难报道的反应,印证了广播媒

体所有者的判断,结果带来了广播媒体的迅速转型,使其在信息提供方面拥有了全新的影响力,在未来的十多年里,独立的广播电台总是成为墨西哥重大信息的首要披露者。

墨西哥最大的报纸《世界报》与革命制度党政府的决裂,也是起因于危机事件。《世界报》一直是与政府合作的媒体,它的所有者佛朗西斯科·艾利(Juan Francisco Ealy)一直是革命制度党政府忠实的支持者。但是,1994年发生的一起政治危机事件改变了这一切。1994年总统选举期间,革命制度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科洛西奥(Luis Donaldo Colosio)在竞选途中被人暗杀,艾利是科洛西奥的朋友,他认为政府对这一事件的解释不符合事实,作为回应,《世界报》对这一事件进行了持续性的报道。《世界报》对该事件的报道,是该报与革命制度党政府决裂的开始^{[1]143}。萨利纳斯(Carlos Salinas)总统最先对报道进行干预,要求《世界报》停止对该事件的新闻报道,后来继任的总统塞蒂略(Ernesto Zedillo)也下达了同样的命令,并通过内务部要求艾利停止现在的新闻报道方式。可是此时的艾利已经决定继续改变《世界报》的新闻报道方式,还让该报纸的记者重新对科洛西奥暗杀事件进行深入的调查。艾利的做法最终招来了政府的打压,先是财政部指责他逃税,紧接着被拘留,最后不得不通过缴纳罚款来保释自己。事后艾利陈述自己的想法时说:“可以说这一事件重新推动我继续朝前走,就好像他们给我注射了维他命,不断催促我向前走,不断地说出事实真相,当然我这样做也给他们造成了损害。”^{[1]144}

(五) 私有化改革与电视媒体的转型

墨西哥政府的私有化改革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独立媒体的发展,尽管这些改革最初的目的是为了巩固革命制度党的执政地位,也达到了预期的效果,但是同样产生了一些不可预期的结果。革命制度党政府的私有化改革最终还是波及到了电视媒体,萨利纳斯政府于1993年8月将国有电视频道私有化,这项私有化改革的结果是阿兹特克电视台(Televisión Azteca)的成立^{[5]103}。这为墨西哥电视媒体带来了商业竞争,打破了墨西哥电视集团(Televisa)的垄断地位,近20年来,电视集团第一次面对拥有雄厚资金和先进设备技术的全国性电视台的挑战。面对来自阿兹特克电视台的竞争,电视集团采取了一系列应对措施,其中对其独立性最具影响的措施是它开始尝试增加一些独立性的新闻报道。虽然这一过程进展非常缓慢,并且电视集团仍然尽量避免报道一些敏感题

材的新闻。

图2展示的是1986~1995年间电视集团王牌新闻节目“24小时”的新闻报道中,政府题材新闻占据时间的比例,从图2可以看出,一直到1993年,电视集团的新闻报道模式基本上没有什么改变,但是自从阿兹特克电视台成立以后,电视集团对政府题材的新闻报道开始急剧下降,这说明随私有化政策而来的商业竞争促使电视媒体向独立媒体转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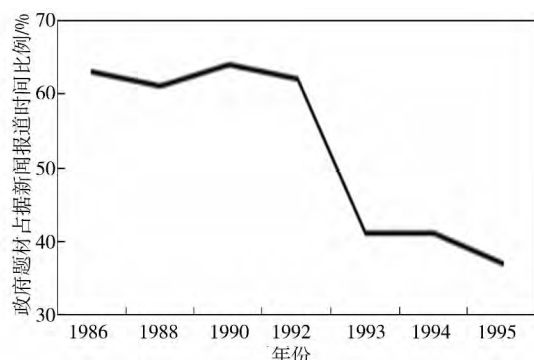


图2 1986~1995年政府题材新闻占据电视集团新闻报道时间比例^{[5]107}

四、结语

墨西哥的独立媒体主要包括公民社会模式媒体和市场驱动模式媒体,虽然它们进行新闻报道的初衷不同,但是在与墨西哥政府的关系上,它们具有共同之处:都摆脱了威权政府传统的媒体控制制度,在新闻报道中拥有自主性、多样性和主动性。墨西哥传统媒体与威权政府之间是一种庇护主义关系模式,政府控制媒体的主要机制是选择性奖励和针对性惩罚。在这种媒体控制制度下,传统媒体主要通过三种方式维护墨西哥威权体制:保证政府对公共议程的有效控制,对一些

有损政府合法性的新闻主题保持沉默,在选举期间对执政的革命制度党进行偏袒性报道。政治自由化并没有直接促进独立媒体产生,独立媒体也不是政治转型的产物。具有新闻专业主义的变革推动者是独立媒体产生的原动力,这些早期出现的独立媒体财务上的成功和职业上的声誉,使它们的独立倾向和专业新闻规范扩散到其他媒体,危机事件的出现加速了传统媒体向独立媒体的转型,革命制度党政府采取的私有化政策将电视媒体也推向了独立。

参考文献

- [1] Sallie Hughes. Newsrooms in conflict: journalism and the democratization of Mexico[M]. Pittsburgh: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2006.
- [2] Daniel Hallin, Stylianos Papathanassopoulos. Political clientelism and the media: southern Europe and Latin America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J]. Media, Culture & Society, 2002, 24(2):177-185.
- [3] Gabriel Molina. Mexican television news: the imperatives of corporate rationality[J]. Media, Culture & Society, 1987, 9(2):159-187.
- [4] 张建中. 大众媒介与社会转型: 墨西哥个案考察[M].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13.
- [5] Chappell H Lawson. Building the fourth estate: democratization and the rise of a free press in Mexico [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2.
- [6] Paul Haber. Book review[J].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2005, 67(1):315-317.
- [7] Alejandro Moreno. Book review[J]. Latin American Politics and Society, 2004, 46(4):161-165.

[责任编辑 彭国庆]